

抗 議

期 十 三 第

暫別詞

總軍之目的(轉載)

日本內閣改組

和平興亞與和平建國(下)

論日蘇之接近

日本在華之紡績資本(續)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轉載)

芬蘭人的哀號

予欲無言集

本 社

汪 精 衛

錢 南

仲 平 譯

丸 山

王 時 傑

毛 一 波

劉 錫 譯

葉 紀 懷

版 出 日 一 十 二 月 一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暫別詞

本社

一 暫行停刊的原因

本刊發行迄今，計出版三十期，歷時十月。我們鑒於時勢的推移，為適應今後之客觀的需要，決定在本期以後，一面暫行停刊，一面加以改組。其緣由如下：

一、就字義言，「抗議」二字，簡單解釋之，就是拿理由來對抗他人。誠然，本刊的主要立場，在實體上是以蔣政權為對象的。十閱月來，本刊的言論，無論是從正面或旁面，無不以批駁蔣政權的錯誤冀其翻然改計為目標。無如蔣政權在共黨及獨裁兩大惡劣勢力交相為虐之下，對於任何忠言至理，終難接受；過去固然是一直執迷不悟，今後亦難期其自覺自拔。我們若一儘以蔣政權為唯一的言論對象，則對它必將勞而無功，而我們的大部分的心血亦徒然白費。我們要想分出一部分的有限精力，用於更為有用之所，乃覺本刊有從名義上到實質上重加考慮之必要。

二、事實上，一年以來，由於和平建國運動的發展，及中日之間的與中國在國際上的形勢之演變，蔣政權已成為強弩之末，算不得是中國問題的主體了。論它的形式，不過是一個偏安的地方割據政權；論它的內容，又不過是虛偽、欺騙、擾攘、混亂的黑漆一團而已。它的自然沒落的命運，已經決定它的自身；固無須我們多加掙扎了。另一方面，中日和平問題與建國與亞問題，已由建樹理論的階段踏上實際行動的階段。怎樣把理論付諸實行？怎樣使實際行動不違悖理論的原則？怎樣使理論更加澈透使行動更加有效？這些纔是中國問題的主體。我們感覺到這個重要性，認為我們今後的言論與研究，尤有加以澈底考慮之必要。

三、誰都知道，蔣政權之所以為非作惡而終於懵然不悟者，除了蔣政權本身的缺陷之外，還因為在它的背面，有幫助桀為虐的帝國主義，尤其因為有那陰險惡毒的共產黨。我們直接對蔣政權抗議，間接還要對帝國主義尤其是共產黨作殊死鬥。然而，時至今日，帝國主義列強因為世界戰爭的爆發，本身已陷入自顧不暇的窘境；而共產黨，不僅已為全世界所唾棄，連在奉之如神明的蔣政權中，也已自相火併了。所以我們現時對帝國主義已不妨稍減顧慮；至於共產黨，我們更可坐觀其自掘墳墓了。因此我們的言論與研究的另一對象，自亦當因時制宜，重新考慮。

於此有當特別聲明者：所謂重行考慮，並非說以後對於蔣政權、共產黨以及帝國主義等惡勢力可以置之不問了，我們是一刻不會放鬆它們；只是目前，我們所不可放鬆的問題，還有比它更大的呀！

這就是本刊暫行停刊從事改組的原因。本刊在極短的停刊之後，將以何種姿態來再與國人見面，想亦讀者諸君不難推知的了。

二 沒有改變的立場與態度

如上所述，本刊命名「抗議」，簡單說來，是以對抗現政府的不當措施為言論之對象的。但是我們之所以對抗政府，乃是對事，絕非對人；在積極方面，乃是為的國家民族之福與禍，絕不夾有人事的私見。當本刊命名的時候，關於此點，差不多費了最大的考慮。為了正名，我們在創刊時開宗明義的說道：

「……中國當此生死存亡關頭，政府當軸，應該以國家為本位，以全國人民的利害禍福為前提，從死路中求生路，從艱苦困厄中求光明。我們對於少數當局者或某種特殊勢力，只知自私而不顧及國家前途的任何政策，決不苟同，誓死「抗議」！」

「中國抗戰，是中國人自動要抗戰；中國和平，是中國人自動要和平。任何國家，對於中國的抗戰或和平，與以善意的援助，我們是歡迎而感激的；任何國家，利用中國的特殊情勢而煽動或摧毀中國的抗戰，或利用特殊情勢以迫誘中國接受屈辱的和平；我們決不遷就，誓死「抗議」！」

「這是本刊的態度之一」（發刊詞）。

本刊的此一態度，就是說明我們的言論態度，是對事而非對人的，是對真理而非對某一勢力或某一國家的，是為中國本身而非為某種背景的。在這個態度上，更可以看出，我們雖然主張和平，並沒有主觀的把抗戰所原有的真價值加以漠視。我們是主張自主的和平，反對被動的無意義的抗戰。

其次，我們又曾說過：「戰爭的本身不是目的，乃是爭取獨立自由的一種手段；目的若達，手段自無再行使之必要。在何種情形，應該繼續「抗戰」，以及如何「抗戰」；到了何種情形，可以相機「議和」，以及如何「議和」；我們將一本國民的立場，就國家的利害禍福，提出來亦誠討論，以供當軸之採擇。」

「這是本刊的態度之二」（見同上）。

此一態度說明什麼呢？就是本刊對於「抗戰」與「議和」二事，根本不把它看做是對立的或矛盾的。它乃是一個實體的兩面，一個目的，一個手段。那一種手段有價值，不能決定於手段的本身，要決定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例如：七七事變當時，日本的軍事動作，純然出之於侵略的姿態，故當時的手段自以「抗戰」為上策；及至日本有了覺悟，翻然改計，願以平等待我，由近衛首相發表和平聲明的時候，則「議和」乃是適當手段了；進而言之，假使中國在和議席上仍舊不能達到目的，和議難成，仍當不屈不撓，以「抗戰」為後盾。這是我們對於戰與和的看法，也就是我們的立場。我們之所以主張及時議和，就是從這種觀點所得的結論。我們又曾這樣說：

「此次中日事變，將從軍事中心主義的戰爭，進而入於政治中心主義的戰爭，戰事的決勝點將從戰場移到議場，從士兵移到民衆。第一期為抵抗侵略而戰爭，是抗戰的時期，就是前期；第二期為抵抗侵略而議和，是「抗議」的時期，就是後期。我們要在「抗議」的時期，將和平的方案取決於全國民衆，而後由足以代表民意的政府實施其內容。我們要在「抗議」的時期，爭取自動的和，摒棄被動的和（創刊號：「從抗戰到抗議」）。

這是本社主幹仲平君受命於社長而寫的一段，也就是我們在客觀上研討而得的結論——中國應該及時議和，而且在和議席上以抗戰的毅力去抗議。因此之故，我們沒有把議和一事看得比戰爭容易，正相反，它要比戰爭更艱難到若干倍。

觀於上述，本刊同人的最初立場，實際上也不是單純的以對抗蔣政權為事的。我們之所以要說明這一點，就是表明我們的立場與態度，始終如此，始終負責。我們不但要對過去三十期的言論負責，同時還要對今後的言論負責。這個責任不只在文字之間，尤其深深刻在本刊同人的心板之上。我們敢向國人宣誓：在中國未能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的一天，我們一天不放棄這個在言論上的責任。我們更可以明白的說：現在我們雖是主張和平，主張對日協調，但是從事和平運動的，如果他們以後也和蔣政權黨徒一樣，只顧個人的好惡，不顧國家的禍福；或者日本現在雖在理論上表示對中國取平等態度，若將來在事實上仍然以不平等待中國；那我們將重行扯起「抗議」的旗幟，誓死對抗。雖然我們都是文弱書生，拿不出什麼具體的武器來，但是我們有勇氣，有良心，有血膽（參考創刊詞）！

三 過去的奮鬥

說起「血」來，不由地回想到本刊的身世了。我們關於出版刊物一事，動機遠在一年之前——是前（二十七年）年十一月間，本社同人任無意中由談論中日問題而結合，共同認為中日不該長此結怨，更認為兩國並非沒有協調之道。由於這種見解的聯繫，便在無形中結成一個小小的團體，時相過從，時相談論。自然，我們自己雖然無所為，但談論總不免是偷偷地。到了十二月下旬近衛聲明發表，繼之以汪先生發表豔電，我們的興趣是加強了，也就有了決心——決心在中日問題上打開一條出路（主要見解參看分載於本刊一至三期的「第三條路」）。當時便預備出版一個純粹研究性的刊物，只因同志太少，人力財力都湊不成數。到了去年一月底，總算有了眉目，便於二月五日出版一期「大路」。

「大路」的言論是純客觀的，而且一句也未談到中國應該與日本講和之類。不料第一天送到代售書局，第二天便被退回，據說上午賣去一冊之後，下午就接得警告信，說是「灰色」；同時印刷所也來回頭。問題便發生了：除非有後盾，纔能幹下去，我們是什麼也沒有預備；除非不談中日問題，只談抗戰有道理，那就可以風行無阻，但這又何必要我們來？剩下來，除非是不幹了：「大路」就是這樣短命而亡的。

但是我們心終不甘：為什麼我們連正當說話的自由也沒有呢？而且連何人來阻擾也不知道。我們是人，人要說話；我們是論事，事有真理。在一個短期間的沈悶之後，我們一半雖說爲了氣憤，一半到底爲了真理，便再下決心：非幹不可！並且要公開的幹！「抗議」二字的來由，也就種因在此處。

在此期間，我們所籌備的，不是人力，也不是財力，乃是印刷和發行的特別辦法。時間是經過了很久，辦法尚未成熟。然而，雖未成熟，逼着我們急不能待的情勢來了：那便是三月二十一日汪先生在河內遇刺一事。在四月一日創刊號的「編後」上，我們說明：

「我們本想稍緩一些日子再做，以便籌劃能充分一些；忽然見到河內謀刺汪精衛先生事件發生，感覺國事愈弄愈

糟了，不忍再抑壓利害是非之辨，於是趕早出來說話。

所謂「趕早出來說話」，易言之，就是不顧忌地把和平救國運動的旗幟扯起來。實在，本刊之問世，在上海，是公開宣傳「和連」的第一聲。在「主和即漢奸」的惡氣瀰漫到極點的當時，它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不用說，我們早已預料，本刊問世之後，必然要遭遇到比所謂「灰色」的「大路」更為惡劣的障礙，但我們早已準備着了：準備怎樣接納善意的批判，又準備怎樣對付惡意的陷害。故在「編後」上預先說道：

「我們什麼也不隱飾，什麼也不遷就，本着良心，說老實話。讀者對於我們所說的如有指正之處，極所歡迎，只要大家皆能赤心為國就好了。至於用狗血噴人來無理取鬧，我們不是狗，只有用人血來注射牠，狗也許能變為人！」

本刊出版了，不出所料，本埠的幾家共產黨系及蔣系的報紙，如「譯報」「華美報」「大美晚報」「中美報」等，先後批露其所謂「揭發」的大文，果然把本刊罵得狗血噴頭，異口同聲誣指本刊為「漢奸刊物」。我們對於牠們的罵，並不覺可慮；相反的，倒是要牠們罵得響，注意的人纔多；只要有人注意，我們相信注意的人決不至於都是和牠們一樣是戴有顏色眼鏡的，豈不是反而替我們盡了一臂的宣傳之力？所以我們最初對於牠們的惡視還是以善意相處的，在第二期的「編後」上，我們還是不動聲色的說：

「以汪先生這樣赤心為國的偉大領袖，他的說話竟也不能自由，不禁對所謂民主的招牌和社會輿論，不勝其沈痛的感慨！究竟汪先生的言論（註：指「豔電」及「舉一個例」）是不是較之共產黨的惡毒文字為惡毒可怕？希望讀過汪先生的實論的人下一個良心的評判！這種判斷，並不是對汪先生或某個人某方面負責，乃所以為國家！本刊的態度和汪先生的態度一樣，只要有人能明白我們的用心，任何犧牲我們也甘願了。」

我們所以如此悲而不憤，為的想拿真心誠意來感化牠們，可不知牠們中毒已深，人性全無，無可感化；因此本刊纔從第三期起，開始與牠們在文字上正面鬥爭（參攷各該期對於「申報」「譯報」「華美報」等報紙言論的駁斥）。

你們一面駁斥牠們，一面還按期把刊物送給牠們，並在封面上註明「請嚴正批評」字樣。而牠們是怎樣呀？除了胡亂寫上數百字的漫罵字眼而外，什麼批評性的文章也沒有見過，只是橫一個「漢奸」，豎一個「漢奸」。可是牠們也不甘心我們的駁斥，在既無理由足以反駁的苦笑之下，便使出另外的方法以為報復了。

牠們的方法，是唆使重慶的特務機關，用手榴彈一類武器來照顧我們。

付印創刊號的印刷所，不知怎樣被牠們「發覺」了，第二期便為此而延期。第三期的「編後」上說明：

「在本月五日交排後，已排得差不多了，忽然有三位彪形大漢光顧到印刷所，以「抗議是漢奸刊物」為詞，勒令停工，其威力為「否則將不客氣」。可憐印刷所老板知道什麼呢？免得麻煩，停工了。我們便又跑了幾家，可是他們總說：「共產黨的東西倒沒有問題，真正漢奸的也沒有問題，獨有說到汪精衛的動也動不得」。這真使我們莫名其妙到萬分——然而我們却又明白了一些！」

自然，牠們的辦法比我們強，因此第二期不得不延期。不僅如此，在第二到第四這三期中，印刷所不知換了幾家，可憐有幾家連工資也未賺得合價的印刷所竟真的吃着幾顆手榴彈！這便是牠們唯一的制裁輿論的辦法！

然而，牠們的手榴彈多，我們的毅力也不算小；牠們善於揭發，我們也學得一些奮鬥的方法了。他們會釘，我們會

避；他們逆來，我們順受；也就莫奈我何了。在此，有不得不附帶一說的：自五月至八月這幾個月中，承印的印刷所，發生過五六次「罷排」風潮，其原因是由於重慶特務機關之恐嚇及共產黨之煽動，但印刷所老板說：「我倒不相信，偏要做給他們看！」因此先後有若干工人被開除。老板受了我們的津貼沒有？可憐他不但未拿着一文額外的錢，而且賠折不少添置新鉛字的資本。在發行方面，因郵寄被扣，寄售被抄，只有祕密地委託報販兜銷；可是這也不過是把艱苦由我們轉移給報販來嘗受而已，有幾個報販被打得頭破血流，仍然想盡方法去兜售。當他們售完一期回到發行所的時候，我們安慰他們，而他們表示：「吃苦不要緊，只要你們將來不要忘了我們！」話雖直率，忠誠可見；可是我們如今有什麼足以相報呀！我們對於這幾位印刷所的老闆和職員，尤其是這一大羣報販朋友，真不知怎樣纔能表示感謝之忱！最可貴者，他們並不借故居奇的敲竹槓，倒是同心同德的表示：他們也願意為和平努力。和平運動深入到這等民衆之間，我們還覺得什麼事是痛苦的嗎？回想當時，整個上海，因為還沒有一個完全公開宣傳和平運動的出版物，所以反對派的惡勢力得以聚精會神的專向本刊進攻。照當時的形勢，本刊的壽命無日不在朝不保夕的景况之中，如今竟能安然的進行到預期的終末，我們不僅爲自己的工作感覺到無上的快樂，同時爲和平運動的前途也更加增長了無窮的希望。所可憾者，本社中堅份子黎融君中途病逝，令我人損失不少；一想到他雖已病臥床榻猶竭力撐持、嘔血寫稿的情景，尤不覺黯然神傷耳！

四 我們的出路

末了，我們還要向讀者聲明的：本刊之暫時停刊，是爲了適應時勢的需要，施行改組，在極短時期後——大概不出一月，我們又要與諸君相見了。我們並沒有準備休息，事實上，我們正加倍的向着原來的目標努力。周佛海先生說：「中日和平這種偉大的運動，已漸漸從第一期進入第二期了；我們的努力，也要適應着客觀的需要，改變我們的作風了」（見「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又說：「戰難，和亦不易；和平的工作不知要比打仗困難多少倍」（「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我們的停刊和改組，便是這個意思。本來，當我們計劃停刊改組之際，曾有幾位同志勸我們不必再辦刊物，勸我們去參加實際政治工作，換句話說，就是教我們丟開筆桿，去掌朱印。他們的意思，就個人出路一點而言，是很可感的。但是，只爲個人謀出路的心思，對與不對，都不必問，即說有其必要，那也要想到，個人的出路是要跟着國家民族的出路走纔是合理的。目前的中日和平問題雖已見到一線曙光，但若攷究到中國的前途能否完全順利，中國的出路能否完全光明，在我們看來，把握還是很小。老實說，目前距離中國有出路的時期，還有十萬八千里。國家民族還未有出路，個人可以先談出路嗎？我們敢斷言，如果從事和平建國運動的人，有一人存了這種心理，和運中便有一分的失敗因素，有多數人存了這種心理，則和運必全盤失敗無疑。這種人不是以和平來建國，是以和平來「建」他自己；目標既乖，焉有不敗？我們的話，決非故作清高，只要明瞭「大我小我」的道理，只要明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那末，說我們爲國就所以爲己，亦無不可。

我們現在是退一步說，說是爲自己，爲自己的將來出路打算，認爲現在還有繼續努力之必要。因爲我們理想中的個人的出路以至國家的出路，覺得還有很多的話要說，很多的主張要發表，很多的問題要研究哩！所以，我們此時不但不能說與讀者諸君告別，倒是要請讀者諸君也趁此短期的餘暇，爲我們今後說話的要端，多多致慮，在再見時來指正我們！

特載 建軍之目的

汪精衛

——元旦後二日對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開操典禮訓詞——

各位武裝同志：

今天所講的，是建軍之目的。

凡是建立一個軍隊，總要有一定之目的，以所有的精神氣力，向着這目的，勇猛前進，纔能夠達到我們的理想。

我們建軍之目的在那裏呢？爲什麼要建軍呢？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呢？

總理遺囑第一句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革命之目的，建國之目的；也就是建軍之目的。革命之目的很光大，而革命之途程却是很長遠的。我們在這長遠的途程上，一步一步的邁進：第一要明白認識最終的目的，不可迷失了方向；第二要明白認識每個階段的任務，不可錯亂了步驟。革命目的，只有一個，而其途程，却要經過無數的階段。這就是說，每個階段，任務雖不盡同，而其根本目的，則前後相承，始終如一。

十四五年間是本黨改組後策動革命的第一個階段。那時候，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其最迫切需要的任務，則莫過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陷於次殖民地境遇，不自由，不平等，已經百年了。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誰陷中國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是帝國主義者。誰爲革命作梗，使中國人民不能悉力以求自由平等？是軍閥。軍閥

是革命的障礙，而帝國主義者則是軍閥的靠山。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昭示國人的指導口號，一是打倒軍閥，一是打倒帝國主義。

十六七年間，革命勢力，逐漸伸張，及於全國，眼見着統一快要告成，軍閥快要崩潰了；無如一方面有共產黨之中途叛變，在國內破壞革命，一方面有帝國主義者之兵艦示威，從外面壓迫革命。以言對外，則實力決戰，勢所未能；以言對內，則分共清黨，實有必要。尤可痛心的，因獨裁者之暴戾恣肆，黨基動搖，政綱解組，內戰綿亘，竟成分崩離析之局。直至二十年秋，九一八之變，本黨同志知非精誠團結，無以共赴國難，纔有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復合。從那時起，國民革命到了另一階段。革命之目的，一樣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其最迫切需要的任務，則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要於經濟建設。和第一個階段比較，指導口號雖然改變了，革命精神却是一貫的。爲什麼要清除共匪呢？共匪肆虐，患在腹心。他們之破壞革命與軍閥之阻撓革命，沒有不同；他們之糜爛地方，摧殘民生，與閥之擁兵自衛，食民而肥，也沒有不同。所以清除共匪的工作，正是打倒軍閥的工作之延續。爲什麼要經濟建設呢？國力源於民力，國力不振，由於民力不充。所謂國力：分而言之，爲軍事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合而言之，則軍事的力量，實以經濟的力量爲其基礎。經濟不發達，而欲強求軍事建設之現代化與科

學化，必不可得。民力不充，國力不振，對內尚且不能鞏固統一，對外又怎能抵抗侵略呢？所以「打倒帝國主義」與「經濟建設」，兩個口號，也是相聯貫的。以前，我們要使人人知道，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如今我們更要使人人知道，非充實民力，發達國力，不能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根本方針，沒有不同。所不同的，前者是目的，後者則是方法，前者重在宣傳，後者則重在實行。

由廿一年至廿四年間，中樞當局，本既定之國策，忍辱負重，艱苦一往，內致統一，外謀和平，所以完成國家建設，亦即所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當冀東事件華北情勢極度危急之際；大會宣言猶明告國人：「和平未至絕望時候，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那裏知道，剛剛一年，西安事件，獨裁者屈服了，根本國策搖動了，和平建國的機緣也就隨之而中斷了。

廿六年盧溝橋事變，不得已而奮起抗戰。在戰事中：一般民衆，冒著絕大的犧牲，忍受絕大的痛苦，爲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般將士，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爲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般民衆，能夠如此，一般將士，能夠如此，實在是中國人民民族意識之最大表現。民族意識是立國之本，必須善爲誘導，善爲培養，使之發揚光大，萬萬不容誤用濫用，促其頹喪的。戰爭既爲不得已之舉，則覓取時機，結束戰禍，恢復和平，實爲忠於謀國者應有之決心和責任。負最高軍事之責者，應該時時刻刻熟察大勢，統籌全局，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有什麼理由任令戰禍拖延，置國家

存亡人民痛苦於不顧？廿七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中國維護和平之本來目的，昭告世人。一則曰：「蓋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再則曰：「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其言之深切著明具如此。獨裁者有什麼理由背棄歷年既定之國策，蔑視本黨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所一致議決之方針！有什麼理由使一般民衆一般將士爲中國之自由平等而犧牲的血，徒然白流！

我們今日，必須大步的踏入國民革命的新階段。這新階段的指導方針，是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示的「和平」，「反共」，「建國」。這方針與國民革命之最終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一貫的。爲達到這最終目的，在現階段中，要本著這方針而努力。我們爲什麼要建軍？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便是要在現階段中，本著這方針，努力奮鬥，完成現階段的使命，以達到最終目的。由上面所說，可以知道，這方針完全是循著歷次大會宣言，而決定出來的。前後相承，始終如一。

「和平」，「反共」，「建國」三個口號，六次大會宣言已就其一般的意義，說得明白清楚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和平反共建國」與建軍之關係，及我們武裝同志應有的認識。

一、「和平」。和平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被侵略的國家間

然要尊重和平，就是侵略的國家，也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和平。只知戰爭，不知和平，那是十分可恥的事，除非野獸，不會這樣。有人說道：既然和平了，爲什麼要建軍呢？這種說法，真是誤解了和平的真義，誤解了建軍的真義。須知道：和平不是空言可致的，必須有實力爲之支持，然後真正之和平方能確立。建軍之最大目的，就是要以實力來支持和平，維護和平，保障和平。有了力量，不但和平可致，並且有時候，戰禍可免。例如此次歐洲大戰，牽動英法德三個大國，在十幾年整軍經武，加以以戰爭科學突飛猛進之後，大家總以爲戰端一啓，爲狀之慘，必非前次大戰所可同日而語。但直到現在，海戰之外，雙方空軍陸軍，還是取着守勢，大規模之惡戰，迄未開始。爲什麼呢？因爲雙方知己知彼，各有顧慮。空軍呢，大規模的轟炸，必至循環報復，同歸於盡；陸軍呢，德國要攻入馬奇諾陣線，要冒絕大的犧牲，法國要突破齊格非陣線，也要冒絕大的犧牲，所以互相守望，不敢輕舉妄動。有些政論家軍論家倡爲科學昌明促進和平之說，以爲戰爭技術愈進步，則大家對於戰爭之恐怖愈大，因而對於避戰謀和之心事也愈迫切。此種觀察，雖未可視爲定論，而且歐戰前途，亦未易遽加以判斷，然而要維護和平，必須有力量，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固然在他日或者有一較好的方法，以保障和平，用不着拿軍事力量來做保障，然在今日則沒有軍事力量，不能保障和平，情勢顯然，所以和平與建軍，不惟沒有矛盾，而且相依爲用。明白了軍事力量，是要來擁護和平，不是要來破壞和平，則建軍之目的明，而軍人之道德精神，亦於此可見了。

以上是就一般而言，再就現狀來說，我們所謂和平，自

然是指中日和平，了無疑義。中日兩國，經過了這場血戰，彼此自知，而又互知：中國不能滅亡日本，日本也不能滅亡中國；戰則兩敗俱傷，和則共存共榮；此實爲中日和平之基點。我們知道，和平是雙方面的：雙方有了需要，還要有誠意，有決心，有勇氣，纔能夠見之於實行。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已以最大之勇氣表示其和平的誠意和決心了。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語意明白；那一個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便是指那一個。近衛聲明，「無領土之要求」，「無軍費賠償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致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明白表示，日本不但無滅亡中國的心事，且願以平等待我了；爲什麼我們不努力在和平之中，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什麼我們不遵奉總理遺教，聯合願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日和平之大義明白如此，無可懷疑。中日和平如果實現，則中國建軍之目的，其非爲對付日本，自無待言。然則中國建軍作何用呢？就原則上說，中國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自然要有軍事力量，來維持國家之自由獨立，這也是無待言的。就應用來說，則中國目前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反共。

二、「反共」。關於此點，打算撇開理論，側重事實。有兩層先要明白的：其一，所謂「反共」，不是反對蘇俄，而是反對第三國際的擾亂陰謀。姑勿論蘇俄與第三國際，名實關係，判別如何，但我們始終認定，對俄邦交是一件事，對第

二國際的擾亂陰謀又是一件事。其二，從前顧慮，日本提議共同防共，或將因此而干涉及於我們之軍事及內政；然近衛聲明，已經指出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這種顧慮，也可以消除了。

論起反共，有國內的反共，有國防上的反共。先就國內的反共來說。我們的反共，自十六年武漢清黨以來，始終一貫。我們並沒有因為西安事變，而出賣了十幾年剿共的人民血汗，與將士血汗；所以我們的反共，不待煩言，是一直做下去的。我還要明白告訴各位武裝同志，我們不但要拿軍事力量來反共，並且要和各種力量合作來反共。所以我們今日，不但要樹立反共的軍事力量，尤其要樹立反共的民主力量，只是軍事反共，是不夠的。軍事的反共力量，必須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種種反共力量配合起來，纔能夠清除共匪，絕其根株。剿共之役，用兵不為不多，為時不為不久，而卒未能根絕共禍；其最大原因，即在於只知軍事剿共，而不知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同時着手。反觀歐洲各國，共產黨在德意，沒有立足之餘地，不用說了；即在英法，也不能任意煽亂，為所欲為。戰前法國共產黨扮演其所謂人民陣線，鬧得震天價響；及至戰事發生，一經政府取締，便銷聲匿跡了。至於英國，雖然還有共產黨，却始終守着民主政治的常軌。總沒有像我們中國的共匪，割據西北，四出煽亂，那麼猖獗的。其原因是：英法是民主政治的國家，民主力量有了基礎，所以共匪的一切擾亂陰謀，便無從發作。所以我們對於軍事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必須同時並進，本於民權主義以改造政治，本於民生主義以發達經濟，使反

共的軍事力量，和一切反共的民主力量結合起來，纔能夠貫徹反共的目的。

次就國防上的反共來說。去年六月，我在東京，與平沼首相晤談；平沼首相於表示反共決心之後，對兄弟說：『日本不但不能容許共產勢力侵入日本，並且不能坐視共產勢力為患於東亞。日本社會組織有了基礎，共產勢力不易侵入。所引為深憂的，中國社會組織不健全，經濟制度未確立，最易為共產勢力所乘。長期剿共，尚不免有西安之變，死灰復燃，可為殷鑒。中日兩國，同是東亞之一部份，中國有了共禍，與日本有了共禍無異。甚望中國今後為根本之圖，與日本携手，站在一條戰線之上，共同防共；庶幾禍亂之原因可去，和平之基礎可立。』後來板垣陸相對兄弟說：『蔣介石以為日本無力再戰，那是錯誤的，為了剷除共產勢力，莫說五年，就算十年，十五年亦所不辭。』後來近衛公爵與兄弟筆談，更懇切的說：『和平之後，願中國為自己打算，且為東亞打算，努力防共。日本之所期望於中國的，絕非藉此以控制中國之軍事，惟欲求中國充實防共之力量，分擔防共之責任，使日本無兼顧之憂而已。此在華北沿綫，至為迫切。日本之意，亦非欲陷中國於對俄戰爭；反之，正惟恐中國為共產國際擾亂勢力之所乘，以致戰禍重起，故不能不相與協力，為之預防。』其所言日本反共，決心既如彼；其所以期望中國共同防共，理由又如此。

頗聞有人說道：『和平目的，在於消弭戰禍，如今和平之後，又要防共，那不是東面講和，北面打仗嗎？』觀於近衛所言，可以了然。我們並且要明白認識，所謂防共，是防

衛，不是侵略，決不會由防共本身發生戰事。即使退一步說，由防衛而惹起外來的侵略，以至釀發發生戰爭，則在那時候中國是協同作戰，較之今日單獨作戰，有把握得多了。中國單獨作戰，到如今已是第四年頭；什麼國際援助國際同情，不過臨死的嗎啡針，及死後的花圈，中國要這等來有何用處？如今將中日兩國，結成同生死共患難的關係，自然比較前此之獨力支持，安全得多，這是不煩言而自解的。於此，尚有須注意的，所謂共同防共，必須中日兩國，都有防共的力量，纔能得到。從前看過一幅描寫協力的漫畫：三個入踏雪上山，用繩子綁在身上，互相聯着，然後協力上去；到了半途，忽然的有一個人，力量不支，看看要倒了，前面兩個，只好拔腰刀，把繩子割斷，讓他自己墜了下去，不受其累。由此可知自己沒有力量，雖然共同協力，也是徒然。我們既然要分擔共同防共的責任，就要有分擔共同防共的力量。建軍目的，即在於此。總而言之，國內的防共，要有力量；國防上的防共，也要有力量。不但要有反共的軍事力量，並且要有反共的民主力量；反共的軍事力量與反共的民主力量結合起來，纔能夠對內完成反共的工作，對外分擔防共的責任。

三、「建國」。建軍是建國的手段，建國是建軍的目的。為建國而建軍，有極深遠的意義，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到的。我們第一要把軍隊造成國家的軍隊，把以前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形迹，掃除得乾乾淨淨。個人獨裁，是以個人為中心而建立軍隊的，所以他的軍隊，有二層三層的親疎厚薄。因之有無數的猜嫌疑隙。不安；國家的軍隊則是以國家為中心

，軍人視國家為家庭，國家視軍人為子弟，人民與軍隊相處如骨肉，着了軍服是軍隊，脫了軍服是人民，沒有一毫歧異，一毫扞格，一切親疎厚薄的分別，是無從發生的，一切猜嫌疑隙是無從有的；換句話說，一切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形迹，掃除乾淨，方纔能成為國家的軍隊。第二軍隊要現代化。所謂現代化，物質設備，固然重要，精神力、組織力、尤為重要。沒有精神力組織力的軍隊，就算有了新式武器也是徒然。我知道有許多同志慨歎於中國軍隊之不能現代化，這是對的；然以為軍隊有了物質設備，便是現代化，這却只有一半的對。物質設備，誠然必要，我們因此提倡科學化，提倡經濟建設。但是物質設備，不過工具，如果沒有精神力組織力來運用他，則只是死的工具。精神力由修養而來，組織力除了個人內部修養之外，還要注意到團體的共同動作；這些都是極緊要的。總而言之，軍隊要成為國家的軍隊，現代化的軍隊，方能擔負建國之任務，我們因為要建國，所以要建軍。

總括以上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每個階段，革命任務雖有不同，而其目的則一。我們為什麼要建軍呢？為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呢？為的是要打破個人獨裁的軍事制度，建立國家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來擔負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和平，反共，建國。武裝同志們！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你們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你們必須以所有的精神氣力，獻之於黨，獻之於國；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奮鬥中，完成國民革命，得到中國之自由平等！

日本內閣改組

鎮南

本文付梓時，正是閣議緊張之際，米內內閣尚未決定。故文內未曾論及，不無明日黃花之感。但對於日本新聞之希望，固不因久而廢也。——筆者附誌。

阿部內閣又醞釀改組了。照最近幾日的情勢看來，料想阿部內閣的命運之終結，已是旦夕間的事。

阿部內閣的產生，根本上不健全。當平沼內閣因歐洲政策失敗而解體之際，軍部方面，因對歐洲政策之失敗，間接上應負大部分的責任，故對次屆閣權未便全面主張；在政黨方面，對於軍部的政策的不滿，雖已有話可說，終因日本的政黨政治的基礎尚未具體建立，所以也只有從旁吶喊，終無實力足以抬頭。這種形勢，好像形成一個鵝蚌相爭的機會，阿部內閣便是這個機會之下的幸運兒。不過，阿部內閣之產生雖屬幸運，但因其先天的不足，未能好好成長。試考阿部內閣成立以來，既沒有在消極方面做過何等重大的改革，在積極方面也沒有什麼足述的建樹；阿部首相差不多是和代理人一樣，只是在過去的規模之下，做得不好也不壞的維持現狀而已。

這在阿部內閣本身，大概也知道自己是臨時性的緩衝性的過渡性的中間產物，所以也無須有什麼特別作為徒增煩擾了。

如果上述的觀察不十分差錯，那末，今次阿部內閣之改組，實為日本現實政治發展的自然結果，毫不足異。試就報章所傳的閣潮原因來說：據謂閣潮之起因，是由於以「民間對於食米政策的『不滿』」為主的物登恐慌。這理由能成立嗎？我們以為未必。因為日本民間的政治意識比中國民間還要薄弱，決沒有到美英法幾國國民治國家的民衆意識足以影響政治機構的那種程度。即說是的，則這種風潮的領導者必為各政黨，而各政黨在其策動倒閣的活動上，必會拉出比食米政策更大的問題如對華對美外交問題等，以充實其聲勢；可是現在並未看出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敢斷言此次閣潮之真正

原因，不在民間對於食米政策之不滿等較小的問題，必另有更大的原因在；寧可說：由於阿部內閣先天的臨時性與過渡性，此番改組，並不是爲的有什麼原因，而是因爲已到了改組的季候。

這個季候是什麼呢？照我們看來，就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已到了重大決定與積極推行的時期。

單就遠東形勢來講：

第一，中國新中央政府將成立。成立之後，進一步就要與日本開始正式和平談判。接着，便要在實際上開始其東亞新秩序的諸種具體的建設了。這些臨在目前的事務，在日本看來，乃是整個對華政策亦即所謂對華國策的具體的推行。日本的對華問題，占有她外交問題的最大部分。所以對於這一個局勢的來臨及其策應，必須有極充實的政治機構來適應它。

第二，自從開放長江下游一事由阿部內閣向各國試探後，日本所最關懷的美國的態度，反應得雖不甚好，却也不壞。此一動作，好像是一針強壯劑，竟然把萎靡到奄奄一息的日美關係振作起來了。在東京，在華盛頓，都顯着活躍。日本所企求於美國的，原不止通商一

點，尤其在於整個的遠東關係。只要美國對於日本有了諒解；日本的遠東地位即不會穩如泰山，而對華的事變處理也就易於爲力了。可是怎樣便可以與美國攜手起來？或者說，假使與美國攜手不成，又得怎樣去對付？這一件並不簡單的大事，亦非有極充實的政治機構來負責處理不可。

第三，隨着日美關係而轉變的日英、日法、日蘇諸關係，最近也有了顯明的進展。日本對於這些國家的現行關係，雖不及對美之重要，但亦非尋常可比。尤其因爲其間一面有立場相同的，又有絕對相反的，處理上不免複雜爲難。同時，對於這幾個國家的關係，亦在在足以影響對美對華的關係，其重要性也不可漠視。

日本要在遠東生存，要在遠東發展，而且又要從遠東起，建設東亞新秩序，則當上述的三種形勢已經同時演變到極端重要的時候，日本自身的政治的演變，實乃一種自然的適應，是無須乎要什麼內在的原因的。

現在的問題，就日本來說，是政治要如何演變便能適應這個自然的季節？

就內閣改組後的政治形式而言，最簡單的，是生產一個足以代表日本國策

的新內閣。因爲各黨各派之間的政見縱有不同，而其共通信守的國策是不會改變的。可是，若果新內閣是一個偏見很深的黨派，則當其推行國策之際，終不免因本身的主見及反對派的異見，而使國策的實際推行發生多少的左右。這種左右，無論結果屬於何方面的勝利，其不利於整個國策則是一樣的。

在目前舊閣未去新閣未來之際，據聞繼任閣擇的人選，以近衛、荒木、畑俊六、米內、宇垣、池田、鈴木、平沼、廣田、杉山、諸人的呼聲爲最高。試把此數人簡單分析，則除近衛一人是超然派之外，其餘多是軍部中心的人物，政黨與財界的成分非常之小。事實上，日本的政治鬥爭，大體可以說是只有軍部與政黨之爭，現在政黨人物皆無被選之望，其結果若不屬於近衛，自必屬於軍部人物。如果竟然屬於後者即軍部人物的話，我們覺得日本的國策之推行就不免有因黨派的偏見而遭受左右的危險。我們不僅對於軍部從來的政策不敢贊同，而就我們中國的立場而言，過去軍部的舊的大陸政策掀起中日事變，今後的新的大陸政策也未必能完全符合日本最高國策的精神。另一方面，近衛氏不僅很少黨派之見，且因日本的最高國策

就是在他前任任內一手制定的，對華調整邦交的聲明也是由他親自發表的；由他來肩荷此繼往開來的重責，必能勝任愉快，可無疑義。最近一二日內，據聞軍部方面亦頗屬意於近衛，不主張由現役軍人出任，這可說是日本政治上的一大進步。我們爲中國着想，同時也是爲日本着想，覺得日本當局有力挽回近衛重行出山之必要。

其次，就新閣改組後的外交政策而言，與日本最有利的，莫過於澈底與中國做成平等的和平。日本對於遠東問題或者說是對於中國問題所最顧慮的，自然是英美法蘇諸國的競爭勢力。有一部分分的日本當局，以爲支持中國抗日的就是這些國家，只要對於這些國家先行取得諒解，使其不再支持中國之抗戰，則對華問題便可不解決而解決了。殊不知此乃因果倒置之談。因爲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如此，就是因爲中國可以利用；她們利中國供其任外交上縱橫捭闔，以使日本不得抬頭。假使日本與中國做到真正平等的和平，中國必不致再被利用；同時，她們爲要搶救其在遠東的地位，勢必反而向日本遷就。如此日本只有更好，別無更壞。這是我們在日本閣潮問題上爲中國更爲日本着想的又一點。

和平與亞與和平建國

(下)

原勝著
仲平譯

▲中日新意識形態的歷史的意義

中國的真正建國，汪派若是僅僅依存近衛聲明及日本國內對於近衛聲明的誠意，還是不容易達成的。必須用那真正指導歷史潮流的新史觀與新世界觀以決定政治行動，纔有達成之望。也就是說，必須把建國與革命的力量，趁此時會，造成偉大的力量而發展。

中國的建國，是民族革命，但同時也應該努力於社會革命。若不在社會革命上致力，則所謂近代國家的民族國家之建設，是不會完成的。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及俄國革命的不同之點，亦即在此。

民族革命的意識形態，照從來的反帝國主義理論而言，還說不上是完全的武器；社會革命的意識形態，照從來的階級主義理論而言，也是不完備的。因為單純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徒然挑動強大列強的壓迫，造成國土被侵犯的機會；即說訴諸全面的焦土抗戰，也不免把國家轉落到亡國的危機。至於素樸的階級主義，是徒然惹起國家的內亂與分裂，而把國家全體的力量分散消耗。這就是中國的建國革命的理論必須具有世界史所未經驗的新意識形態的理由。

中國之建國，屬於民族國家建設的階段；從而，當前的課題之重點，是民族革命重於社會革命。共產黨看出這一層，因此便放棄它的立憲的意識形態，而混進所謂民族統一戰

線裏而來了；這是比什麼還要明白的論證。可是，民族國家建設的力量，倘若不在社會革命上着眼，是不能夠發揮的。過去，中國為其建國而策行的「抗戰建國」的政策，未到兩年便完全失敗了。這種失敗，正足暴露其理論的不智與力量的脆弱，因而不得不進入「和平建國」之途。

概括言之，以中國現實所經驗的問題為中心而歸結到理論，則中國之建國，至少要把國家的世界地位及其環境，由日本取得保障；中國無須以對外問題為國家的第一義的問題而多事追求，只要在對外問題上具有分擔責任而努力的地位，為發展國家以企圖內部之革新與力量充實，在這上面纔能獲得成功。易言之，中國可讓日本專念於興亞，在這種興亞之中，以達成建國之大業。這就是興亞與建國的歷史的交流之所在。

由此種觀點，及由此種觀點所構成的歷史的必然性說來，日本是可以創造新的興亞意識形態的；同時，這種興亞意識形態與建國意識形態，必須包含歷史的關聯性與交流性。

日本的有識之士及進步主義者之間，對於興亞意識形態或即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论，雖不完全，却已提出東亞協同體論乃至東亞聯盟論等理論了。但在汪派方面，關於興亞與建國的新意識形態，還未有所聞。可以說，中日現實政局之所以未能很光耀的展開，這裏是一大原因。

中國的先覺者們，對於日本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想，

東亞協同體論及其他的意識形態，常以爲日本是要拿日本的支配來代替白種人的東亞支配，以爲日本仍不免是偽裝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在疑心暗鬼的心理之下，不肯使日本爲專念於東亞大業以從事決定歷史潮流的努力。他們又以爲，把東亞與建國交流起來以敷設國家發展的路線，這種思想，只有少數日本的進步主義者有之，而彼等在國內所占的勢力却是非常微弱。他們還以爲，假使如此，則日本所興起的歷史的地位，乃是居高凌下的指導地位了。

因此之故，他們對於日本的進步主義者之間所提出的種種新的與亞意識形態，總是疑之懼之而不與接近；試問，這樣還能夠把中日和平真正解決嗎？

中國的對日接近，若不發軔於東亞與建國的意識形態的交流之上，則中國只有在與東亞不相關的舊的建國意識形態之下，以與日本的舊歷史上的勢力相結合。

汪派的國家觀，起於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建設的階段論，而且這個建國論是以舊意識形態而前進的；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無疑的，對於權勢承認并保障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的英美法的表面的態度，勢必照舊向着完全接受的方向展開。

日本的進步主義者，由其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立場，對於英法美等表面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的態度，是加以排擊的，而在中國的舊意識形態則與之相反。例如，關於廢棄九國公約的主張，他們在其建國的階段論上，認爲這種問題是第二三級的問題，或者說，他們是抱承認態度的。

目下中國的建國問題，在汪派的主張中，大概是這樣的：第一，要把中日關係從戰禍轉變爲和平；第二，要實現和

平，必須組織新中央政權；第三，新中央政權組成後，必須使其從英法美以至世界各國，獲得承認。第四，中國新中央政權之組織及其世界地位之獲得，對於置念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日本，也是大有關係的。

因爲如此，汪派對於與英法美各國間的摩擦，力圖迴避，乃屬必然之措置。可是，汪派以這等理由與英法美接近或妥協，從而承認在東亞大業的前提之下應該廢棄與排除的英法美等國既存的帝國主義權利勢力及條約，對於這種政治行動，在日本便不得不考慮其重大的警戒。這樣一面的情勢若果現實化，則在支持汪派運動的日本進步主義者及新興勢力也就難免發生極端對立化的危險了。進言之，英法美諸國，對於汪派的主張，雖也抱有舊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情，但他們一方面也還在策劃着：使日本的舊勢力與蔣介石重慶政府相結合。不用說，日本的立場是不以蔣介石爲對手的，可是英法美等國的此種陰謀，難道不會由變形而出現嗎？

我們覺得汪派對於此點有慎重考慮之必要。否則，汪派的建國運動與政治行動，無論對於日本的新興勢力或舊勢力，皆將背離而去。從而，在汪兆銘氏所持「無日本即無東亞」的信念之下而努力的建國運動，結果亦必失去其目的之大半了。

這個現實的重大矛盾，怎樣才可以解決呢？唯一的方法，是創造與東亞建國交流的中日新意識形態。中日兩國應一面創造這種新意識形態，同時要把在這種新意識形態之下行動的新興政治勢力結合起來。中日問題及東亞問題，惟有由這種新興勢力的能力計劃與行動，纔能夠得到最聰明的解決。

論日蘇之接近

九山政男著
林子旭譯

——譯自中法公論新年特大號——

日蘇關係，在世界注視，特別是在英美非常關切中，終於踏入新的階段了。十二月七日，日、蘇、『滿』代表所組成的混合國境委員會，已在赤塔依照預定的開幕，目下正在友好的氛圍中從事於國境勘定的審議。國境的不明確，誠為國境糾紛事件類生的禍根。而足以免除該禍根的國境勘定的問題，自東北事變以來，每次發生爭執的時候即提出討論，然而實際上又從未組織過此類國境勘定委員會，而且亦從未實際予以審議；徵之過去的此種事實，可知此次赤塔會議所具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了。不但此也，日蘇通商及漁業上各種問題的初步交涉，亦已在東京，莫斯科等地同時進行。現在回憶過去日蘇近年來異常緊張的關係，目觀其波瀾雲詭，變化莫測，實在不由不使人感慨係之。

日蘇關係會得步入這新階段，表面上雖說是以『滿』蒙國境諾蒙亨事件

停戰協定成立為其樞紐，實則諾蒙亨停戰並非就是惟一的樞紐。要論國境紛爭事件的停戰可作日蘇新關係的樞紐，那末，去年八月張鼓峯停戰，亦該就同樣可成為樞紐了。當戰鬥猛烈的張鼓峯事件停戰之後，雙方亦會約定勘劃紛爭地域，然而既不見有國境委員會，亦從未進行勘劃國境的交涉，終且以不了了之，埋葬在若有若無之中；到了今年，遂又惹起了國境不明為其原因的，規模更大的諾蒙亨事件。此種數年來忽明忽晦的慢性的日蘇緊張關係，在張鼓峯事件，在諾蒙亨事件，無論展開怎樣猛烈的戰鬥，無論徒事怎樣多大的犧牲。經驗怎樣慘痛，區區瑣事，決不能成為誘導日蘇進入新關係的機緣。就是說，這次日蘇的新階段，必須從客觀情勢的變化，必須從更根本的方面綜合起來考慮。而此種變化，又不可不明白主要是起於蘇聯方面的。

其第一點，就是與日本共取東西夾擊蘇聯之勢的納粹德意志的和蘇聯接近

；第二點則為德蘇接近給予轉換的德意志對英法戰爭爆發所引起的歐洲的新情勢。不特說，蘇聯對於最近必顯部的歐洲事態，自不得不寄以最大的關切，且欲乘此千載一時的失戰機會，鞏固其西圍，向西隣從事各種工作，其東隣的安全，當然亦極關重要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蘇聯，在地理上，固有不得不直接且錯綜的考慮其東西的形勢者。

二

日蘇關係近年來這樣異常的緊張，必須看做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秋德日防共協定成立之時。當時，蘇聯不但視此德日防共協定為反蘇協定，且深信該協定中必含有秘密軍事協定。遭受此種強有力而且極積極的德日夾擊形勢之威脅，蘇聯的恐懼是深刻的。被此種異常的恐懼所迫，蘇聯於是內而預布極端的戰時體制，激動國民奮發有為，外則力謀與英法妥協，以期對抗這德日夾擊的陣勢；對於德日方面，則又出以報復性的強硬態度。其對付德日尤其是日本的強硬態度，自事實上廢棄行將簽署的新漁業條約以次，各方面都逐漸明白的顯示出來，故意壓迫北庫頁島的煤油權；每年反復鼓動蘇領漁業問題的糾紛，當年

國事變之時，則認為良機莫失，竭力進行其對華援助，利用中國的抗戰力量來作其對日消耗戰略及赤化中國的推進力。蘇「滿」國境事件一年一年的增加其嚴重性，去年的張鼓峯事件而展開至今年雖說是局部，戰史上則可大書特書的諾蒙亨的大戰鬥。

這一串的蘇聯的行動，表面上宛然是任對日本挑戰；雖然蘇聯的真意，却應解釋為實正希望着相反的效果。德日協定乃是對於蘇聯重大的威脅；但威脅要臻至具體化，德日雙方猶有若干前提條件必須完成，尙有多少餘裕，蘇聯是看透這一點的。實際行動即使是迫在眉睫，究不是馬上就發動的。換句話說，蘇聯即乘德日侵蘇的各種條件還未完備之時，先整頓起國內的戰時體制，並以窺伺德日陣營崩析的機會。在德日各種條件尙未完成以前的蘇聯此種對日挑戰的強硬態度，甚且可解釋是意在脅威日本拋棄攻蘇的野心的一種工作。在德日協定之前而表示對日妥協的讓步態度，乃是示蘇聯以弱點，結果反而使人覺得「蘇聯可侮」，而促進德日侵蘇。反之，炫示紅軍的偉力，來使德日協定鬆懈，或出諸報復行動，以表示蘇聯的強硬態

度，反而可挫折德日侵蘇的野心，這用意，當時旅居蘇聯的作者，是早就看透的。

三

就因為蘇聯有此種意圖，而且日本「侵蘇的各種條件尙未完備」，乃使直至最近的日蘇關係呈現着特異的形貌。那就是，日蘇關係只管向着異常的慢性的惡化這方向邁進，然畢竟不至於化成全面的日蘇戰爭。如每年糾紛重重的漁業問題，一到千鈞一髮的最後危險關頭，就往往化險為夷，避過危機；又如動員了貝加爾區猶感不足，且從歐俄方面先後調集數師兵力，一萬部汽車，一千架飛機；在滿蒙曠野中展開一大激戰的諾蒙亨大事件，亦終限於局地的告一結束。凡此事實，都在說明着這一點：蘇聯就是這樣看透日本的不擴大方針，同時復想要在這預料其將局地化的戰鬥中，竭盡九牛二虎之力，誇炫所謂「紅軍的偉力」，俾將「蘇聯可怕，蘇聯不可破」的印象，直接給予日本，間接則給予德意志，來使德日遲疑且拋棄侵蘇的野心。過分誇示着紅軍偉力的蘇聯，常在其國中的報章上連篇累牘的轉載着高喊「紅軍可怕」的外國評論。

然而蘇聯此種舉動，因國境事件而過分誇炫紅軍的力量，爲着報復德日協定而壓迫北庫頁島的利權，蘇領的漁業問題，非法拘禁日人和日船等等，亦不過徒使日蘇關係更形變化而已。蘇聯以威脅的言行一步一步的惡意進逼日本，日本亦不甘示弱，以牙還牙的報以惡意，因而逐漸加強了惡化的程度，這便是四年來日蘇的關係；而此種關係，又具有總在不至化爲正式日蘇戰爭的限界內演變着的特質。

四

然而迫使蘇聯採取上面那種對日態度的最大原因，最近已經消滅了。由於德蘇接近，由於看起來似乎建築在相當深固的基礎上的德蘇提攜，蘇聯所視爲最大威脅的德日夾擊陣營，現已被壞無餘；且在蘇聯絕大關心而不得不傾其全力以應付之的歐洲，復發生了新的事態。於是現實蘇聯先從遠東即後門的安全獲得確保，然後乃於前門製造可以傾注主力的條件，那自然不能不說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它便設法緩和從來的日蘇的緊張關係，甚至且一變而好似在期望日蘇接近了。

蘇聯在孤懸遠隔的「滿」蒙國境，

犧牲了數以萬計的生靈，喪失了千架以上的飛機和數百部戰車，結果又幾乎毫無所得；可是在波蘭戰線上，戰傷者僅二千數百人，即獲得波蘭過半的土地。傾其力量與精神於鞏固那犧牲少而實得多，且重要非常的心臟部歐俄的四邊，當然是現實蘇聯所應選取的途徑。

總而言之，蘇聯西方客觀情勢的變化，加以以諾蒙亨激戰所得的教訓，雖可說是直接使蘇聯改變或者行將改變其對日態度的原因，但其根本的事實，還是在於蘇聯本來就不願和日本抗爭，而日蘇之間亦無倘不出諸戰爭即無從解決的問題存在，和平解決根本並不是不可能的。有如上面所說，最近數年來蘇聯對日強硬態度的真意，不能認為是在誘起日本的挑戰，相反的，且可看做是在防患日本對蘇野心於未然，所以和日本保持和平關係，可說是蘇聯渴望已久的。同時，日本亦並不希望徒見毫無實利的日蘇關係日趨尖銳，在蘇聯報復式的壓迫下的漁業問題及北庫頁利權問題等之實際解決，亦是其久已企盼的。而且日本現時又從自來的國際關係的橫流中解放出來，可由自主的立場來調整和修正對蘇問題了。這裏便有打開日蘇關係

的基地。

過去九月三十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氏曾在蘇聯最高會議中，作闡明蘇聯對外政策的演說，其中關於日蘇關係的部分，照例自然會有若干誇大和冷嘲，然而畢竟不愧為近年來未曾有的友好態度了；其成為當時全世界關心日蘇關係人士的注目的鵠的，乃是理所當然的。莫氏謂：『倘如不單是我方，雙方都表示好意，那末，國境諸問題的事務上的折衝，應該是會得到所期望的成果的。而且很明白的，大可進而移入日蘇通商諸問題的交涉。日蘇貿易的發展，亦應認為於兩國均屬有利。我們於此，就具有行將籌劃改善日蘇關係的根據了』；這正如莫氏前此在其外交政策演說中言明德蘇通商協定之可能，不久即與德蘇政治提攜的實現如響斯應一樣，莫氏此種聲明中，可推測日蘇之間現正進行着重大的交涉。

然而日蘇關係，畢竟依然不見有急速而且重大的展開，一如上面的推測；祇是這一路趨向慢性惡化的日蘇關係，現正行將到達一個嶄新的階段，卻是事實。而此種展開，究竟又能表現至何種程度，亦屬不容過事樂觀。

五

日蘇關係倘如單從直接限於日蘇二國的關係，而且又從現實的角度來觀察，則日蘇不但可排除毫無意義的反目與對立，而調整日蘇的實際關係，使之言歸於好，所必要的，是日本方面應無異論。意識形態自為意識形態，互相干涉對方的內政的原則，現存於日蘇之間，所以意識形態的問題，或者不至於成為日蘇兩國關係的障礙。國境勘劃問題，預料常有相當的困難；雖然，若能如莫洛托夫所說，只要雙方有善意，亦就儘可解決了。

再則，由於蘇聯之報復式的故意的壓迫而最近不得不大為衰退且困難日增的漁業及北庫頁利權企業，其正常的經營獲得保障，乃是日本最引領渴望的。每年可獲三四千萬日圓的外貨的遠東蘇聯領海中的日本漁權之確保，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度約有三十萬噸的運出量輸至日本，三六年度則激減為十五萬六千噸，而逐年磨滅減產，今年且陷於毫無運出量的狀態的北庫頁煤油權，以及二三年來淪於企業中絕的慘狀的阿地煤權，解除此種非法的壓迫，並保障企業的安全經營，不見得就如何困難。因為蘇聯之

壓迫日本的北方權益，主要含有報復德日協定的意味，乃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可藉口報復的原因現已消滅，日蘇關係如果恢復常態，則蘇聯亦就可望改善其非法的壓迫了。

像漁業問題之類，自從德日協定成立，致使所謂『酒匂加茲洛夫斯基協定』原可締定者乃變成無期延期以來，每年總是反覆糾紛，糾紛之後纔好容易每次締結了一年間的臨時協定；即如去年，在每年末總應締定的臨時協定的交涉，竟至遷延至今年，到了今年四月，且產生了無條約狀態，回想起來，實在使人頭痛。而這次的漁業交涉，據說已反映了日蘇的新階段，很有成立長期的漁業協定即以酒匂加茲洛夫斯基協定為基礎來判的可能性了。

再則，通商協定的初步交涉亦已進行了，最近松島瑞典公使在其赴任途次，曾滯留莫斯科與密科揚外國貿易委員長進行該項交涉。日蘇近年的貿易關係，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對蘇的出口每年約達三千萬日圓，其主要者作為中東鐵路代償資金而由蘇聯大量買入的；可是到了三八年三月終，是年即猛跌為五百十八萬日圓，至今年十月，且僅剩二十八萬日圓；同樣，來自蘇聯的進

口，是三五年約一千八百萬日圓，三六年約二千一百萬日圓，三七年約一千三百五十萬日圓的，三八年可就激減為七十五萬日圓，到了本年度十月，僅有二十七萬日圓之微，三八至三九年度，可說是在幾乎無貿易的狀態。日蘇關係倘能恢復常態，且新訂通商協定，則有無可資相通的日蘇的貿易，定必大為激增。自然，同在非常時期之下的日蘇二國，其貿易自必會受限制，例如日本所需要的煤油，蘇聯年產量雖有三千萬噸以上，其國內的需要孔殷，乃屬實情，所以究能有多少煤油供給日本，自然是疑問，至若其他如鐵礦木材之類，大概有希望。

六

像這樣日蘇關係若單在日蘇二國的關係上，從實際方面看起來，日蘇關係的調整，很明白的，斷不至有什麼異議的。問題只是蘇聯的真意所在，恐怕就在日蘇政治關係之改善，而想把政治問題先實際的經濟問題而解決，或者一同解決的。蘇聯自來的態度，常將實際的經濟問題和一切政治問題錯綜來起。蘇聯始終在企圖與日本改善政治問題。例如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和平關係既

然因此互不侵犯條約而奠定，其餘的經濟的各種問題，自然亦隨之解決，或者有意解決，蘇聯所固持者就是這原則；日本則反之，以解決日蘇間諸懸案為前提條件；雙方的見解這樣差異，就是使日蘇關係難於乃至無法調整的癥結。就是今日，蘇聯亦依舊，否，今日且更進一層，希望着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不難推測的。只是這次蘇聯的對日態度，似乎並不十分堅持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為絕對的前提條件；其態度預料是在際着手進行調整日蘇關係時，將與調整交涉的進行，同時提起政治問題。蘇聯倘如採取此種賢明的現實態度，則日蘇關係的整個改善，決不會沒有機會。縱令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方面未能即予同意，實際上效力與互不侵犯條約相等的別種協定，亦將會發見探求的途徑。

有如以上所說，日蘇關係如果單獨作為日蘇間的問題來看，調整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若涉及中國問題，日蘇關係可就複雜之至，而甚感棘手了。日本方面，不待說，要離開中國問題來放慮日蘇關係，自然難之又難；橫置於日蘇間的中國問題，惟有靜待果毅而明決的政治方法來解決。

日本在華之紡績資本(續)

王時傑

據鐘淵紡績會社「新京」辦事處之調查：昭和十年末，在『滿洲』之紗錠共十七萬五千餘錠；十二年，已激增至二十五萬四千餘錠。觀上表，最近一年來竟又大事增擴。布機，在十年度末僅一千四百餘台；十二年亦激增至三千台；十三年末則將突破五千台。是以日本國內棉紡品對『滿』之輸出已不若九一八事變後強烈之激增：如十年輸『滿』之日紗，為九千五百俵，十一年激增為四萬五千四百俵，十二年則僅增為四萬六千俵。輸『滿』之加工棉布，近有日減之勢：如十年為四萬五千五百捆，十一年激增為二十一萬捆，十二年已減為十七萬六千餘捆。是即明白指明資本主義活動之矛盾；因為資本主義輸出的結果，商品輸出自必至於作繭自縛的地步（根據日本棉織物工業聯合會出版之『棉工聯』月刊第三十八期，及日本『東邦經濟』月刊第八卷第十二期）。

鯨吞『華北』棉花資源，是日本侵華的最大目標。七七盧溝橋事變，演成此次之中日全面戰爭，先後佔領『華北』『華中』之後：紡績資本大軍，依其在『滿』活動的經驗，亦積極來華活動。先就其對於棉產方面的企圖而言，有如下述。

日本對『華北』的棉花資源，已推行其『九年計劃』。該計劃的增產目標，有如下表（據日本『棉工聯』三十九期）。

年 份	美 種 花	土 種 花	合 計
一九三八	二·二四六	一·九五八	四·二〇四
一九三九	二·二四九	二·一五四	四·六五三
一九四〇	二·八〇三	二·三六九	五·一七三

一九四一	三·四七〇	二·三五七	五·八二七
一九四二	四·一九九	二·三四五	六·五四二
一九四三	五·〇七〇	二·三二七	七·三九七
一九四四	五·九七二	二·三一二	八·二八二
一九四五	六·八三七	二·三五九	九·一九七
一九四六	七·六六五	二·三三五	一〇·〇〇〇

依此增產目標，『華北』農田之利用，又在日方計劃之下，將目前的植棉面積一千五百餘萬畝，逐年增加到第九年的三千萬畝。換言之：在今後九年間，『華北』農民在日方統制之下，非將其種植麥荳等土地一千五百萬畝為日方棉紡業種植其所需原料之棉花不可。

九年內增加『華北』植棉面積之計劃(單位：一千畝)

年 份	美種棉田	土種棉田	棉田合計
一九三八	八·〇八三	七·〇〇九	一五·〇八九
一九三九	八·九九一	七·七〇六	一八·三六八
一九四〇	九·八九一	八·四七七	一八·三六八
一九四一	一一·九七二	八·二九八	二〇·二七一
一九四二	一四·〇五四	八·一一九	二二·一七四
一九四三	一六·一三五	七·九四一	二四·〇七七
一九四四	一八·二一七	七·七六二	二五·九七九
一九四五	二〇·二九九	七·五八二	二七·八八二
一九四六	二二·三八〇	七·四〇五	二九·七八五

依代表日本紡績資本的『華北日軍當局』的計劃：『華北』的紡績工廠生產設備，最多不可超過一百十萬餘錠之上。這種限制，為確保其國防紡績前途所必需，並為貫徹其『日本工業，中國農業』的原則上所必要。依此最高生產設備估計

，則『華北』的棉花最大消費量不過三百五十萬担；如以其他消費作一百萬担計，則最高消費是共約四百五十萬担。是則上項增產計劃如達成一千萬担的目標時，即有五百五十萬擔的過剩棉產。此項過剩生產額，即日本紡績業者所期待的原料供給。乃昭和十一年，日本輸入的美棉約四百三十萬擔；今後即可取給於『華北』了。即日本國內紡績業今後發展上所增大的棉花需要量，亦已在今日對於『華北』棉產增加計劃中，一併先為妥予準備了。

既為供給日本紡績業的需要原料而實行增加『華北』的棉產，則『華北』的棉花市場，自非鎖閉其門戶不可。惟因剛在推行增產計劃之初，遽然統制買賣，必遭中國農民的嫉忌；而將影響增產計劃的實現；所以對於統制棉花交易，日方乃不免有所顧慮，皆主緩進。但中國農民非特早有戒心，對於植棉，極不踴躍；加以游擊隊的隨時騷擾，到處破壞，農事秩序亦根本未能安定；所以日本對於這種增產的如意算盤，目前已有趨於失敗的形勢。依照日方預定的生產目標，在昭和十三年度棉之產量為四百餘萬担，然按之各方收穫量來估計，半數都不足；如各方對河北省產棉的估計數字，與前此比較如下：

近年河北省棉花生產額之比較(單位：担)

一九三三	三三〇	二、八三六、〇〇〇
一九三六	三七〇	二、五四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	三八〇	二、三〇七、〇〇〇
一九三八	三九〇	一、二五八、二四〇
「東洋棉花」估計數		一、二〇九、〇〇〇
「日本棉花」估計數		一、一七七、六〇〇
「改進會」估計數		一、三〇七、一二二
上項估計之平均		一、二五八、四二〇

因此之故，在百物高漲的今日，天津棉價的漲風，愈為劇烈。往年天津棉價，每包平均最高不過五十元左右；在昭和十二年八月中即已躍出七十元關外。『華北』原棉價格的空前騰貴，使日商為之大驚失色。他們以為此種漲風，純由華方及在華英商之爭購，與天津租界對於國棉投機商人庇護所致。於是『華北』的日軍當局，秉承日本紡績資本家的意志，乃厲行其所謂『棉花統制』。此種統制的内容是：

- (一) 先令『華北』各關禁止棉花之出口，實行門戶封鎖政策。
- (二) 實施『棉花輸出許可制度』，非經日方代表機關核准者，一律不准輸出；俾日商得以獨佔當地之棉產。
- (三) 為粉碎天津在『華北』棉市場上之中心地位計，着今日方所辦之『華北棉花公司』在濟南、石家莊、及天津非租界區域，分設棉花收買機關；並限令中國農民與棉商，非將其棉花售於該機關不可。
- (四) 由『華北棉花公司』公定收買棉花之價格，禁止華商自由抬價。

『華北棉花公司』，並已擬定控制棉價之計劃：在新花上市時，規定『低廉收買價格』，大量吸收；並禁止華商等之囤積；務使『華北』民間之存貨竭蹶，而後劇烈提高棉價，俾農民樂於改種棉花，使其『增產九年計劃』之進行得以順利完成。(根據日本『國際經濟週報』第十九卷第二十三期)。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一波

十八 共產黨治下的職工組合

『俄國革命了』，『工人階級專政了』蘇維埃黨的走狗——中國共產黨，天天向着我親愛的中國工友們耳邊高叫着。是呵，俄國是革命了，但是工人階級何嘗專了政呢？現在的俄國，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專政罷了。他們根本上破壞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社會革命，承認着沙皇時代的專制政策，壓迫着全國的工人階級！

現在，我願意說一下共產黨治下之職工組合的情況，使中國的工友們明白俄國現在的工人，是處於怎樣的地位。我們在沙皇時代，工農階級的階級意識十分薄弱，故當時職工組合的會員，還不過三四十萬人。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便增至百萬人了。那時的工人漸知『工人的事，要靠工人自己來辦』；於是乎組織了『工人監察』，防止資本家之過分的剝削，而保障他自己階級的利益。甚麼是『工人監察』呢？它是一種由工人組織的團體，設立在各工廠及製

造所；它的功用，是在監視工廠中一切的進行，凡輸出貨物與定貨等，概須得該團體的同意，特別是撤退工人一事，是要經過它的允許。然而這種組織在十月革命後便被共產黨解除了！他們藉口說：現在沒有資本家了，你們需要這在做什麼呢？解除了罷！其實俄國現在何嘗沒有資本家？成千成萬的『勳滿滿』（新經濟政策施行後的暴發戶），却鎮日在用心剝削勞動者呢！請問，共產黨政府有何法使俄國的工人階級不受掠奪？

現在俄國職工組合的會員已增至五六百萬人了。這樣的增高數，是表示甚麼？是表示在共產黨專政下工人能夠自由活動麼？不，這不過是表示俄國工人自己的階級意識較更明晰起來而已。

但是俄國的職工組合處於如何的地位呢？照實說罷，俄國現在並不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工人階級專政』，在理論上是說不通，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工人要求解放，是應該自己起來實行革命，打倒統治階級，而自由組織

與自由聯合去管理產業等等，並不須請甚麼人來專政！就是工人階級的本身也不能這樣做。因為所謂專政，只能限於少數人的獨裁，決不能屬於某一階級的全體。

現在俄國雖掛着『工人階級專政』的招牌，實際上只是為少數共產黨所把持罷了。一九二五年三四月間，有個英國人華德博士曾到中國來講演，他曾十分賣氣力向中國人吹牛說：『俄國列寧黨在政治上的勢力自然是大極了，然有職工組合的大勢力來限制它』。其實事實何嘗是這樣呢？俄國的職工組合，它雖然是一種與列寧黨的政治組織相對立的一種經濟組織，但它只有勞動權而無經理權，且須絕對服從政府的指揮。一九二一年哥倫太，托羅斯基等主張將產業歸職工會組合管理，列寧竟不加許可而未成事實。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職工會，在俄國所居的地位了。

現在，俄國的工人亦如其他各國一樣，失業、罷工、暴動，是他們自己的家常便飯；俄國的政府亦如其他各國一樣，壓迫、囚禁、殺戮，是他們對付工人階級的好手段！

從上面這些事實，他教訓我們中國工人以甚麼？他是教訓我們中國工人不要再走這路了！不要再上共產黨的當了！

芬蘭人的哀號

Hannes Keijola
劉 譯

編輯先生：

目下蘇聯瘋狂的侵略波蘭，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駭，然過去數年中，布爾希維克虐待居住於俄屬克米里亞及列寧格勒附近的芬族人民，却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反響。這二者間，恰成一個極鮮明的對比。過去數年中，芬族的家庭，不斷的遭受赤黨的搜查。芬人往往於夜間被捕，並被遣送至蘇聯領土最遼遠的地帶。且遣送時慣將父親及成年男子派至一處，而婦孺則又遣至他處，故芬族的家庭多被弄得四分五裂。芬蘭人所受的待遇，真苦不堪言，即至今日仍復如是；但關於這，全世界卻無人知道。即全世界報端亦從不見述及這些俄籍芬蘭人所遭受的此種殘忍野蠻的虐待。這些俄籍芬蘭人，是我們芬蘭民族中的優秀份子，那歷代被人熱烈歌唱着的卡勒華拉歌曲便是他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

所有的報紙，都讚頌蘇維埃政權，讚頌「斯丹林股份公司」驚人的成就。當蘇聯帶着血跡未乾的手，加入了國際聯盟的時候，她竟宣佈所有蘇聯一切殘忍的暴行，均為俄國自身之事，與他人無涉。於是芬蘭政府對於那些被殺的芬族學生，也祇得不聲不響了。近幾年來，蘇聯被認為是日內瓦紳士之一，而她的代表也常常被選為國際聯盟的主席。假如這次蘇聯侵芬的舉動，及其軍隊實質的不斷衰退，果真能使全世界，睜開了眼睛，認識了蘇維埃文明的本來面目，並看穿了莫斯科的虛張聲勢的實情；那本我們芬蘭人真值得驕傲了，因為我們為大眾謀得一宗利益。

芬蘭不願捲入英德戰爭的漩渦。她不願為人作嫁，或在國際戰場流血。她是一個貧瘠的小國，希望獨立生存，與任何國維持友好關係。三個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國家，一向認為我們是其中之一份子。

我們對英的關係，一向是愉快的；英國一次一次的借錢給我們，當然是毫不足怪的事情。至於對德國，我們又有另一樣的感覺。當我們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和我們國內的及蘇聯的赤黨作戰的時候，德國曾幫助過我們。有不少芬蘭人——筆者也是其中之一——曾受過德國士兵救命之恩。芬蘭年青的軍官，都在德國受過訓練。在海爾新其的一所木教堂的外面，有一所墓地，長眠着在芬蘭戰場上陣亡的德國士兵。每年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二二二

『欲無言』，已不期然而滔滔言之了。只要紙墨筆硯觸入我的視界，白紙上便會有黑字在蠕蠕而動。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我自己也說不出動聽的理由，記得魯迅先生從前為女師大被解散的事這樣說過——大概我們的反對派也是高興聽的：

『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着，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如果沒有破壞，自然用不着修補；我本來不想說什麼，但又教我如何就不說？於是不期然而滔滔了。

魯迅又說：『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還破壞者也誇耀它。』是的，不說『文

有不少我們德國的朋友，到海爾新其的墓地這裏來，向他們的英雄致敬。

第一次大戰給我國帶來了自由，那末這一次大戰將給我們帶來什麼呢？當然，對於誰是這次戰爭的魁首這個問題，是英國呢？還是德國？我們芬蘭人也和世界人士一樣，分成兩派見解。不過我們芬蘭人誰若忘記了德國過去待我們的恩惠，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芬蘭人。這次大戰已經造成許多國家中間不自然的結合，將來若發展成芬德的直接衝突，那真令我痛心疾首了。

對蘇聯，我們會訂立過不侵犯條約，兩國的商業關係近來亦大加改進。至於文化方面，亦有接觸，不過我們非常謹慎，不受她的政治觀念的麻醉。我們的軍事領袖從不會十分相信我們的東鄰。他們勸我們人民多化一點金錢在軍備等項上面。現在看來，這真是一個賢明的政策啊。

芬蘭這次鬥爭的結果將如何呢？我們初步的成功，大大的增加了我們自己的勇氣；同時也使那些讚頌蘇聯的人，驚訝不置。這班讚頌蘇聯的人，他們認為蘇聯在世界大局之中，縱非最重要的因素，亦要算是很重要的因素了，芬蘭獲得得到的世界人士各種同情，着實驚人。就連上海也捐助了幾千塊錢。據說芬軍已經收到了不少飛機和其他軍用品，並且有數千瑞典人已抵達芬蘭。此外尚有其他各種援助。

這種援助當然愈多愈好，但僅這些援助就夠了麼？我們的總統加力阿，在他的告全世界書中曾說過：若芬蘭不能迅速獲得他國戰鬥員的援助，芬蘭對蘇的抗戰，是不能支持多久的。那末問題就這來了，這些戰鬥員從那裏來呢？讓我們來看看：英國是決不會派遣軍隊到芬蘭來的，她現在正和德國作戰。法國的騎兵是很著名的，但是她現在還在害着多少年來的「恐德病」，所以她的騎兵都駐守在馬奇諾防線上。至於芬蘭最好的朋友美國，也不會派兵到芬蘭來的。再者我們的近鄰瑞典，已不是數百年前的瑞典了；雖然現在幫助芬蘭的瑞典人，作戰和加洛林時代人一樣的英勇，但一般的瑞典人，都已失卻了戰鬥的精神了。據報載，挪威也已經表示不能有什作為。兩位丹麥飛行員，到了芬蘭，助芬作戰，但他們已被丹麥當局視為罪人。芬蘭現在的處境是如此如此。假如芬蘭能獨有充份的金錢，她或可把所有的紅軍都收買過來。但是收買過來以後，怎樣養活他們，卻又成問題。她是償付美國戰債的國家，但是她實在是貧困到了極點，每天所食的麵包，大部份要靠外國輸入。並且大多數農民，都不甚富有。下層納稅者的經濟情形，也

明了，就概括「中國的一切」吧，現在可不是這樣嗎？重慶當局就是一邊來破壞，一邊在誇耀，但從來不修補；除非就讓「一切」毀滅，我們總不由得不滔滔地修補的。

然而，在我們所做的工作上，也許有人以為是不道德的：譬如說我們「太挖苦重慶之類」。那末，魯迅也說過：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方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方，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衆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纔安心了。

「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捧之使高，壓之使足，便可以於已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既然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

沒什麼大的進步。所以大批飢餓中的蘇軍俘虜，立即成爲芬蘭可怕的負擔。所以希望我們外國的友人，趕快設法把這些俘虜，安插到世界另一個地方去，俾使他們在那裏可獲得一個溫飽。不過我要特別提一句，就是這些俘虜決不可安插在三個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中，尤其不能安插在瑞典。因爲瑞典境內，已深深的中了共產主義的毒了。

這件任務，以美國爲適宜。美國祇要派幾隻船到挪威海港，便可以把他們運至新大陸。

假如這一點一經實行，蘇芬戰很有立時停止的可能。因爲那樣一來，將有大批紅軍，歸順波蘭，其人數之衆多，將爲世所罕見。那時由蒙諾罕進攻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並把蘇聯的烏烟瘴氣，掃蕩一空，真乃是輕而易舉之事……

把這一點嚴加攷察之後，有許多政論家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注意。他們說芬蘭事件是世界道義的一個試驗。芬蘭總統也曾說過：現在是這個時候了，世界大國應想出一個解決戰爭的辦法，不應再想殺人的勾當了。芬蘭事件足供世人深深的思考。德蘇接近是事實。不管怎樣，祇要戰事繼續下去，芬蘭終將成爲犧牲品。蘇聯的勝利即等於芬蘭一切內毀滅。那時芬蘭人民均將被驅至西伯利亞。倘若蘇聯在芬蘭進展緩，德國將替蘇聯編制軍隊，結果芬蘭仍難免覆亡。蘇聯軍事機構，一旦受德人的控制，情形將大大的不同了。這一點，我們芬蘭以及倫敦巴黎的人士，不久都將看到的。

有一件事，我們應該注意。即斯丹林曾利用過古錫蘭這位可憐傢伙，企圖製造一個『自由的芬蘭國』，像古錫蘭這類人物，斯丹林的後院裏還多着呢。不必擔憂，英國的，法國的及其他各國的『古錫蘭』，也是有的，他們都在準備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家；祇要斯丹林把們從後院裏招呼出來，說要和他們分別簽訂友好保護條約，他們便將立時動手。人的意見是各有不同的。卽令是好友，對於某件事亦不見得抱同樣的見解。我們希望所寄託的許多偉大的人物，都慘遭失敗了。但是最主要的問題似乎是：英國何時方能停止其對弱小國家開空頭支票的行爲呢？列了何時世界上弱小國家纔能與大國站立平等的地位，同向和平繁榮的康莊大道邁進呢？我個人看來，這次戰爭，和其他的戰爭一樣，都是英國製造出來的。所以謀取和平之道，是英國的責任。我那冰天雪地的戰場上，鮮紅的血愈洒愈多了。這種恐怖的戰爭必須制止。此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一九四〇，一，四

我懷疑魯迅有先見之明：把共產黨怎樣挾持蔣介石和一般被麻醉的民衆怎樣迷信抗戰的心事說得纖毫畢現！共產黨不去管牠，一般民衆，如今除了『很不安』，可有別的結果？

我們不是共產黨，用不着『壓』蔣介石，我們並未麻醉，也用不着『捧』他；我們怎樣呢？照魯迅說：『最奇怪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提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如果當初見河水氾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我們的方法就是『挖底』的『挖』，或者說就是『挖苦』的『挖』。這樣說是不道德也就不以爲奇了。究竟我們的挖並不是破壞，實在還是修補。一方面的破壞工作一日不止，我們的挖與修補也一日不停的。

所以，在今天說話暫告休停的時候，我要歸根說明一下。

抗 議 旬 刊 第 三 集

二 十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出 版

編 輯 人 江 鎮 南
發 行 人

第 一 發 行 處 河 南 路 三 〇 三 號

第 二 發 行 處 福 州 路 三 通 書 局

定 價 國 幣 五 角